第 54 卷 第 4 期
2017 年 7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4, No. 4
Jul. 2017

哲 学 研 究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

王 泽 应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长沙 410081)

摘　要: 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并深度阐发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度把握以及全球各种危机难题的治本之策,揭示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国与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命运休戚相关、福祸一体、生死与共的关系,要求摈弃以往那种全然不顾他人、他国正当利益的利己主义和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建设一个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有着深远而深刻的伦理创化意义,不仅为建构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奠定了价值基石,为发展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矗起了精神大厦,而且为创造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人类伦理文明提供了义理支撑,凸显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建纲立极、创业垂统的伦理神韵和价值。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共赢;伦理创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B 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4-0005-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既能满足中国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又能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所彰显的伦理智慧、文明精义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政要、商界精英和学界领袖以及平民百姓的高度认同,已经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的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伦理创化意义,能够在如此纷繁复杂、多元多样且价值冲突不断的时代凝聚大多数人的价值共识并成为一种新型伦理文明的理论基石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关乎人类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大本大源问题,涉及全球伦理的整体架构、当代国际关系伦理的内在要义和人类伦理文明的发展趋势等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关键性、枢纽性和决定性问题,也是立于中国伦理文明基础之上为当今世界开出的伦理良方,为结束零和思维、抛弃利益对抗、建构和谐共生的世界伦理文明提供了价值目标和行为指南,具有伦理文化革故鼎新和建纲立极的创化意义。

一、奠定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的价值基石

全球化是当今人类正在经历并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集生存境况和发展趋势于一体的连带性运动和社会化过程,它以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的全球性流动以及时空压缩、传播快捷、开放共享的特点,“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①,从而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特别是“互联网

收稿日期:2017－01－28

作者简介:王泽应,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GZD007)成果。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3 页。

+”和现代信息技术更以一种非常深刻而又强烈的力量迫使人们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其发展的要求,不仅引发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而且重塑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

全球化在带来世界各国经济共生共振和共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深刻而严重的全球问题,诸如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经济增长率放缓和失业率的上升,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和风险,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以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等关系,使得现代社会发展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冒险,导致民族精神和家园意识日趋淡化,人在世界的意义被同质化的倾向所代替。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使得个体成员每每产生难以适应的焦虑症,进而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在全球化所束集的高容量高密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的身份成为一种跳跃(hopping)、即时的东西,身份的识别及其认同面临来自自身、他人和社会集体的种种危机。全球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化,成为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它在确证和实现人的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阻碍人的发展的问题全球化了,全球化的吊诡、陷阱和危机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应运而生,而且始终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纠缠在一起。全球问题是决定人类共同命运而又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共同性问题,迫切需要有破解其难题同时又能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高超思路和有效对策,迫切要求建构既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又能引领其健康发展的全球伦理。

面对着全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建构一种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思考与行动选择。全球伦理最先是从思想界发起共同倡议,然后被政治家和国际组织所重视,在上个世纪曾经一度盛行。1988 年在美国巴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理事会以及第十届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会世界大会上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该宣言认为“我们的地球是相互依存的民族—国家构成的,无论在这个星球的某一部分发生什么,都会影响到其余的部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世界共同体都有高度的责任”。① 这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向世界倡扬的全球伦理,凸显了全球化对人之命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人们对相互依存关系应有的道德觉醒和道德责任意识。与此同时,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也在宗教界倡议建设全球伦理,1990 年 2 月,他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作了主题为“为了生存,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性伦理标准”的报告,并于当年出版《全球责任》一书,倡扬建构全球伦理。后来他又与库舍尔共同起草了世界宗教议会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于 1993 年 8 月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上获得通过。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宗教界人士六千五百余人参加会议并聆听了宣言的当众宣读。该宣言强调指出,“没有新的全球伦理,便没有新的全球秩序”,并认为“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② 孔汉思还单独出版了《世界伦理构想》的著作,对建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伦理及其必要性作出了自己的论说。1995 年,在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领导下,世界管治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报告,倡导建立一种“世界公民伦理”(global civic ethics)。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世界伦理计划”的立项,并于同年 3 月和 12 月分别在法国巴黎和意大利拿波里举行了两次会议。应当说,这些关于全球伦理的宣言、倡议和构想整体上具有应对全球化挑战及其问题的针对性、现实性,所以赢得了相当一些国家甚至联合国的认同。但是,这些关于创设全球伦理的构想整体上带有草创性和倡导性的色彩,特别是对如何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建构平等互助与面向未来且能涵容中西方共同诉求和人类整体利益的全球伦理价值观缺乏应有的

① 《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保罗·库尔兹编:《21 世纪的人道主义》,肖峰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3 页。

② 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2 页。

思考和务实的行为举措。因此,如何建构真正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全球伦理,仍然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批判地审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提出的构建全球伦理的设想与动议,结合当今世界全球化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发掘中国古代大同世界、协和万邦等思想智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主张,从而为构建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奠定了理论基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方案,既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深度把握,也是正确认识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是破解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内在症结,确保全球化沿着健康和正确方向运行的伦理基石。它向全世界表达出了我们既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又要积极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挑战,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逆全球化思潮的种种风险,使世界更加和谐而不是更加动荡,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加危险,更加繁荣而不是陷入停滞或者倒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全球化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及造成的发展困境的听诊施治和献策支招,更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点题指路和精准导航,集高明深远的价值合理性与切实可行的工具合理性于一体,表达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和谐美好家园、增进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维护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热切期望和价值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方案着眼寻求全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此作为共同的价值目标,体现了既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又力图使全球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世界共识和中国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思维,也有助于形成并发展起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只有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石又以建设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价值,真正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为什么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形成并发展起一种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以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洞观,凸显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关联性与共生性,为全球伦理提供了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论基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全球化呼唤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必须寻求对那些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的共通解决之道,即心照不宣地领会到:我们都在沉浮与共的同一条船上"。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整合东方与西方同时又使其协同共生的价值特质,要求把整个人类的命运置于共同体的框架内来思考、建设的伦理意义,含有既超越用西方化代替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又超越用东方化代替全球化的东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进而使世界真正成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伦理进步性。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敦勉人类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合作的精神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跨越全球化的陷阱,防范全球化的风险,以达到共生共赢共发展的目的,为构建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肯定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又强调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就此而论,"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②。当然,全球化也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③。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无论是应对气候危机,还是化解金融危机,都需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共生共赢代替你死我活的争斗厮杀。在世界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的新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要求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各种问题、矛盾、危机和挑战,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把地球搞乱,干出损人利己甚或害人

① 豪普特曼:《科学家在 21 世纪的责任》,参阅保罗·库尔兹编:《21 世纪的人道主义》,第 5 页。
②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害己的蠢事。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要求世界各国和人民必须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把自己与他人和整体有机联系起来的共同体意识,学会与他人、他国合作、共建与共享,这是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的核心要义。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正视逆全球化思潮的内在症结,主张以健康、正确的全球化来确保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以促使全球化能够更好地涵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为建构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有着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明确抵制,同时又有着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积极推动多边合作,推动建设共同繁荣、持久发展的和谐世界的伦理深蕴。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特别需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着力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公平正义和贫富差距问题,使全球各国能够共享全球化的利惠和福祉,而不是使某些国家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大多数国家成为受害者。因此既要做大全球化的蛋糕更要分好全球化的蛋糕,使全球各国能够在全球化中有比较好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只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既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又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促进全球化向着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发展方向迈进,形成并发展起一种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

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利益相关和命运相互依存的关系,主张超越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与利己主义藩篱,学会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有机地联系起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习近平强调指出:“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刻着拉丁文铭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及“为当代人着想”,“为子孙后代负责”以浓缩的语言揭示出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的真谛,亦即全球伦理的精神实质是互利互惠和己他两利的,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关系不仅看成是相互依存的,更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并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②“五个美好世界”的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内涵,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趋赴,二者存在一种相互证成、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只有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并依靠基于此价值理念所形成的一致性行为才能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直指全球化时代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顽疾,主张用对话协商管控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用风雨同舟、同心同德的精神卸下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别国的利己主义篱笆,学会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有机联系起来并能与他人、他国共建共享,这样才能干出既对自己有利又能有利于他人、他国的真正善举,确保全球化沿着互利互惠、共生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些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也是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的必然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将漫无边际或乌托邦色彩甚浓的全球伦理拉回到现实的世界,并借助于对全球化趋势的深度把握和问题的深刻洞观,为构建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奠定了理论基石、价值认同的基础和共同行为的基点,同时这种构建本身、这种价值理念的内化和外化,又成为全球伦理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指向,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于一体,无疑有着对近代以来盛行的二元对立的伦理思维的重大跨越和对新型全球伦理价值奠基的创化意义。

二、拱立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的精神大厦

全球伦理是一种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化问题

①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深度把握和深刻洞观而形成的一种世界伦理,是一种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审视其相互依存关系的整体性伦理。国际关系伦理与全球伦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区别。如果说全球伦理主要体现为人类的类特性和整体性及其共同价值的形成与确证,那么国际关系伦理则主要表现为不同人群之间的主体间性及其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上的价值凝结和行为表现。国际关系伦理可以依据全球伦理的格局、框架和基本义理来建构,或内化、表现全球伦理的基本精神,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建构反作用于全球伦理,为其提供实际的运作方案,现实的关系建构类型,以及国别关系的协调伦理基质。

当今国际关系的演进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部西人主宰的、靠科技进步为主要驱动力和润滑剂的、以沟通各国各民族间的联系并使之臣服于资本主义的国际规范为基本内容的、伴随着西方大国由于发展不平衡而衍生的、此起彼伏的、摩擦争斗的历史”。① 可以说,现行的国际关系伦理是西方思维框架和战略利益的集中体现,体现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统率全球,掌控国际关系主导权的愿望和意志。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总统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北约新战略概念》等成为现行国际关系伦理的基础性文本。1990 年 11 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出了美国版本的国际新秩序,强调国际新秩序是以美国为领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和准则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持和平力量的国家,是寻求自由世界的灯塔。奥巴马政府在 2010 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安全、繁荣、价值观与国际秩序四个方面强调确保和推进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认为这四个方面“对于保卫国家安全和在未来几年重塑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至关重要”。② 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日渐形成和发展,旨在确保美国领导地位和战略利益而又不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的现行国际关系伦理的弊端昭然若揭。建构一种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愿望和价值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中国方案有着对非平等、反公正和强权政治等现行国际关系严重失衡的深刻忧思和对国际关系新秩序的重新思考,它着眼于全球的战略安全和持久和平,主张跳出“以暴易暴”“以邻为壑”“非此即彼”的怪圈,建设以平等、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国际关系伦理,真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它所理解的国际关系伦理是在对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整合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和谐共赢的共生主义伦理,主张把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有机地联系起来,建设一种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各个国家都应当以“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审视当今世界大势和国际关系,再不能走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歧路老路,而应当走出一条共同尊重其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平等相待和礼尚往来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对国际关系伦理真精神的深刻把握,也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倡扬。

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建构的国际关系伦理在其具体内容上主要有主权平等、沟通协商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

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意指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主权都是平等的,都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每一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近代国际法就是在平等的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8 页。

② 萨本望、喻舒曼:《重振美国,领导全球:奥巴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述评》,《和平与发展》2010 年第 4 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主权国家的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重申了“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并在第二条明确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本组织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联合国宪章》不仅确认了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且确认了民族国家自决原则，丰富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内容。中国 1954 年提出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7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确认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为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具体规定了国家对领海外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所以习近平指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①主权平等意味着所有国家相互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国家的尊严和主权应当得到尊重。但是，某些西方国家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学说出发，一味地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并试图在维护人权的旗号下粗暴地干涉别国主权，引发了国际关系的严重冲突和失衡。事实上，离开了国家主权的所谓人权只能给人权带来更大的灾难，没有国家主权作保护的人权只会堕入西化主义的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之所以如此看重主权平等，是基于没有主权平等就没有真正平等的国际关系，就没有国家内人权的发展与保护。受他国支配和操控的人权不是真正自由平等意义上的人权。因此，在存在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必须严格遵循主权平等的原则。只有在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促使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建构，才能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发展起一种全面平等的国际关系伦理，这既是解决现有国际关系矛盾和争端的内在呼唤，也是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伦理的必然要求。

沟通协商是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包括各种矛盾和争端必须而且应当坚持的原则，是在尊重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对双方或各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坦诚的交流，以心换心式的恳谈进而达成共识的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方式，内涵着以政治谈判为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以寻求共同利益、达成伦理共识为基本的价值诉求，以增强和发展彼此关系，形成更大的同心圆为目的性追求等要义。诚然，仅凭沟通协商不可能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但是，没有对话就采取行动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侵略行径。一旦认识到对话对和谐共处的至关重要作用，我们就必须学会行动不离对话的处事方式。”②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合则两美，斗则两伤”，彼此交恶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有可能把矛盾激化，问题复杂化，最后形成害人害己的恶劣后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坚持沟通协商的原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③ 沟通协商富含交往理性和交互主体性的意蕴，主张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寻找彼此可以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和各方利益的契合点。只有沟通协商，才能真正达成彼此之间的谅解、理解和互信，建构起一种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须知，无论是平等、合作亦或是共赢，都需要彼此之间的理解与精诚，都需要彼此之间的多层次交往，多方面沟通和多领域协商。就此而论，建构真正的国际关系伦理是须臾也离不开真诚的沟通协商的。越是能把沟通协商引向深入，引向未来，就越能彰显国际关系伦理的质量和水平。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呼唤和内在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伦理精义，每一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伦理学部：《21 世纪伦理学共同架构》，参阅王柯平：《普世伦理对话的原则构想》，《哲学动态》2001 年第 7 期。

③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6 页。

个成员或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身份和地位是平等的,都有共建共享国际关系伦理的权利和义务。良善而公正的国际关系伦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通过广泛调动每一个国家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来达成。只有汇聚起各个国家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才能众志成城地建设和发展起既根源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之中又能保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健康发展和稳步实现的国际关系伦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唤"天下兴亡,各国有责"的伦理意识,要求广泛听取各国的声音和合理诉求,集中各国的智慧,每一个国家在建设和发展好自己国家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力图使国际秩序更加良善,国际规则更加公正,人类前途更加光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精神架构,既体现着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的要求,也有着实质正义和内容正义的精神要素,且含有把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工正义和内容正义有机统一起来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是一种共生的理念,致力建构的是一种共利的关系,努力追求的是一种共赢的结果。它主张国家之间应当"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设定及其伦理精神建构,使各国以交互主体性的视野和连带性思维重新打量这个世界,自觉地将一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与各国长远利益和人类根本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超越现有国际关系伦理的狭隘视域与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建构平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伦理指明了方向并拱立其精神大厦,其伦理创化意义既是深刻的亦是长远的。

三、支撑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的义理格局

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如何在交流沟通中和谐共存而不是文明冲突以至于毁灭,也是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西方,亨廷顿推出了"文明冲突论",坚持认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② 当今世界"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③。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独特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文明是难以融合而是相互冲突的。未来在全球层面上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在地区层面上的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国、集团之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一种分析和预测。他把"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范式,认为冷战后世界范围的冲突将主要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文化或文明将成为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涵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文明之间永难达成交流融合的境界和效果。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及其价值理念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有着建设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的独特功用。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④这里明确谈到"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表达了中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7 页。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国领导人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思和批判。201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①不同民族所形成的文明既有差异,也有相通之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看到了文明之“不同”,却忽略了文明之“和谐”。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和谐或融合远远比它们之间的冲突更多、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性。人类文明无论是在整体意义还是在分殊意义上都是动态和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民族文明的发展都不是与其他文明绝缘式的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只有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和精华的民族文明,其生命力才会经久不衰,长久旺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方案在文明论上拒斥“文明冲突论”,力倡文明和谐论,也必将推动建设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文明和谐论认为,人类文明是多种文明竞相绽放的聚合体,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装点着人类文明的殿堂。著名文明史专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东南亚文明、埃及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中美洲文明等不同文明作出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和比较研究,并认为每一种文明范式“都给了我们一把了解迄今为止文明时代的某种人类社会基本结构以及文化形态的钥匙”。② 多姿多彩的不同文明构成人类文明史的丰富画卷,也为人类享受文明成果提供了多样性的范本。“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③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书写了人类历史的辉煌篇章,也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创造了条件。未来的世界,文明在相互学习、借鉴的同时定会发展出新的形态或类型,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呼唤,也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深刻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本质上是“和而不同”的产物而并非“同而不和”的结晶。“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呼唤和价值指归。《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实生物”是说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多种事物的协调统一才能保证事物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产生新事物。“同则不继”是说排斥了事物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同一就很难保证事物的生存与发展。孔子“和而不同”的伦理文化命题是在继承史伯、晏婴“和同之辨”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将其上升到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亦即君子在为人处世时总是在尊重差异、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与人和谐相处,而不是毫无己见地与他人同一或盲目附和别人。“‘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④和而不同的实质就是承认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谋求人和事物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论坚持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长处,在尊重自己文明价值的基础上尊重他国文明的独特性,吸收他国文明的长处和精华,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的集中表现,也是文明生存、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一种文明只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拒绝或不屑于向他国文明学习和借鉴,就会窒息自己发展的机理,还会引发其他文明的敌意或反叛,无论对自己文明亦或是他国文明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就此而论,只有不同文明之间彼此既相互尊重又相互学习,积极地开展对话与交流,才能造成文明的发展与兴盛。

文明和谐论坚持认为,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体系的深刻体现,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

---

①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9—260 页。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第 48 页。
③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8 页。
④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3 页。

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①因此,应当理性认识和正确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坚持取长补短、包容互鉴的原则,不能对其他文明采取攻击、贬损或一切不尊重的态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②只有摒弃傲慢与偏见才能培育起平等的文明观,也才能形成尊重不同文明的文明价值观。“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是当今文明互补共存的现实。反对各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世界文明多元化、平等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霸权主义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超越其他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并以此来诋毁、贬损或污辱其他文化,或主张消灭其他文化类型,或把同化其他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目的性追求。文化殖民主义则把奴役和控制其他文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不承认其他文化的平等性地位,更不愿意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艾伦·杜勒斯曾说:“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③ 2001 年基辛格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④ 基辛格的这一理论和战略可以称之为“价值观革命”,其本质是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是达尔文丛林法则在文化价值观上的集中体现,是弱肉强食的“人对人像狼一样”的“非文化”和“反文化”。依据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逻辑,人类只能被一种霸权主义的文化所统制,而霸权主义的文化是不可能建树起真正的人类伦理文明的。只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要求的平等主义的文化观才有可能给人类文明带来福音,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便得到不同文明响应和认同的内在因由。

包容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⑤包容互鉴既是文明的德性和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是截然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和谐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主张。“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⑥文明的生命力与活力在于交流互鉴。只有交流互鉴,才能使一种文明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机理,更好地取长补短以发展自身,又能更好地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互相尊重,发展起一种“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发展并建设一种“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要求既必须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又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既肯定各种文明的独特性又重视彼此之间的包容互鉴,并形成肯定包容互鉴和崇尚包容互鉴的文明风习,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欣赏“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格局,崇尚各种文明“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机理,致力于推进不同文明的文明对话与和谐共存。“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⑦是“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情景的生动写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国际关系建设要求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等的准确把握、深度思考而贡献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中国方案”,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方案的伦理创化意义是深刻高远而又隽永的,它不仅为建构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奠定了价值基

①②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9 页。

③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④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全译修订版),胡利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0—331 页。

⑤⑥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8 页。

⑦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三松堂全集》第 14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4 页。

石,为发展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矗起了精神大厦,而且为创造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人类伦理文明提供了义理支撑,彰显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建纲立极、创业垂统的伦理神韵和价值,它也必将为第二个即将到来的“轴心时代”提供可以通约的伦理精神和核心价值理念,抒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On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Wang Zeying

(*Mor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valu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which was proposed and deeply elaborat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ders, i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resent-day world, and a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various global crises and difficult issues. It fully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who have their destinies closely related, share bliss and misfortune together, and go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ogether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networking. It also demands that the previous egoism which completely disregards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people should be abandoned, and that the black or white zero-sum-thinking should also be abandoned, so as to builds up a harmonious world with symbiotic existence, joint development and lasting peace. The valu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s of far-reaching and profound ethically-creative significance. It has not only laid down the valu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fair and reasonable global ethics, which has erected a spiritual building to develop the ethic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with equality, cooperation and win-win, but also provided a righteous support for the creation of an inclusive, harmonious but diverse human ethical civilization, displaying the charm and value of "ordaining conscience for Heaven and Earth, securing life and fortune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continuing the lost teachings of past sages, and establishing eternal peace for all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symbiotic win-win situation, ethically-creative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刘曙光)